



彼岸的文学现场

戴瑶琴 著

中国故事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再兴有其原因。中国的世界地位不断提高，中西文化对话的需求更为迫切。身处海外的创作者更有热情 and 责任感去呈现中国真实的文化面貌和民间风情。同时，西方受众也渴望了解更微观的中国和更精致的中国文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彼岸的文学现场

戴瑶琴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彼岸的文学现场/戴瑶琴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668 - 0447 - 1

I. ①彼… II. ①戴…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I1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8963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2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言

戴瑶琴的第一本自选论文集《彼岸的文学现场》终于出版了。实在可喜可贺！我作为她的老师，尤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高兴和自豪！因为我觉得这本论文集，已不是一般的没有太多学术价值的只为凑数出书的杂乱文章的汇集，可以说，这已经是一本相当完整、全面甚至是比较系统的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全书用现象、问题、作家、文本四个方面来概括她的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了大洋彼岸文学现场的新景观，研究的新思路，重点作家、作品的新面貌、新特质，从艺术精神、主题深化、审美取向和人文关怀等方面来考察世界华文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创新和前景。她的论文大都精致完美，观点独到，论述清晰，视野开阔，知识面广，文采飞扬。读之，时如低回吟唱，时如高歌猛进，像汨汨清流，波浪起伏地汇入奔腾大江。我以为，这本论文集是新世纪以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也显示了我们当代华文文学研究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戴瑶琴可说是新一代华文文学研究的佼佼者，新世纪华文文学评论界升起的一颗璀璨的新星。

小戴之所以能在这新世纪短短十多年多，取得如此的成就，据我所了解，她确有一些过人之处。首先，她把华文文学的研究当作了自己终身的事业，专注热爱，几近痴迷、疯狂的地步。她在中学就热衷此门，大学毕业后，从江苏跑到南昌来读研究生，她多次讲到，就是冲我而来，只因我是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回南京大学读博士，她的研究重点仍是华文文学。博士论

文选题时，她选了较敏感的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华文作家，我以为有一定的风险，可她义无反顾地坚持着。结果，论文的评审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好评，足见她征服了全国来自各个不同大学的评委。毕业后，她来到大连理工大学这个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任教，依然我行我素，坚持华文文学的研究。没呆多久，她获得了公费出国访学的名额，先后奔赴英、美名牌大学，进行了年复一年的访问学习。她搜集资料，访问华文作家学者，写出了一批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她简直是个华文文学研究的工作狂。

同时，她研究的成就，也是与她学业基础的扎实、研究工作的勤奋以及思维的敏捷聪慧分不开的。她在校读书是最努力刻苦的，从不打扮玩耍，兴趣爱好唯有读书。她博览群书，埋头写作，在校期间，她读书最多，发表文章最多，无人能出其右。给她一本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去读，不出三天，她不仅读完，还能拿出一篇篇幅不短的评论文章来，而且，还会有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和价值判断。出国访学，英语交流，阅读英语原版作品，她都没有问题，这为她学习科研又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户。她是当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内少有的能用双语研究的年轻学者，比如研究哈金小说，她就可以参照英文原版与中文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她的论文总是会闪耀出多元文化的光泽。

我相信，她一定能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攀上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我们期待着，就让这本《彼岸的文学现场》作为一个新起点吧！

公 仲

完稿于南昌大学青山湖区 18 斋

2012 年 9 月 18 日

序 言 /1

第一编 现象 /1

中国记忆的文学重塑——论新世纪欧美华文小说的“中国热” /2

论当前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窄化”和“固化” /11

21 世纪文学新势力——新移民海归文学 /19

在海外延展华文之势——评 2009 年欧美华文小说 /23

遭遇“圈地运动”的欧洲华文文学 /29

第二编 问题 /37

论欧洲华文文学的中国艺术精神 /38

试论北美新移民小说的“现代化”主题 /49

欧美华文文学的审美取向 /60

人性的美丽与诡谲——试论北美新移民小说的人性关怀 /64

精神跋涉中的诗意栖居——当代欧洲华文散文创作论 /74

试论文艺作品中主体建构的“雌雄同体”意识 /83

第三编 作家 /95

论哈金的中国小说 /96

蜕变·十年——论张翎 /107

交错在流动人生里的目光——评张翎的小说 /119

文学肌理中的文明想象和文化追求——评戴舫的小说 /127

解读精神密码——试论戴舫的小说 /136

玩的不是心跳——谈裘小龙的推理小说 /144

第四编 文本 /149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浅议《台北人》中花的隐喻 /150

无处安放的自我救赎——评《南京安魂曲》 /161

从“水”到“山”——评张翎新作《睡吧，芙洛，睡吧》 /165

生命中的可承受与不可承受

——读张翎小说《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 /169

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的抒情诗人——再读陶然小说《与你同行》 /172

“面具”背后的伤与逝——评严歌苓小说《赴宴者》 /177

流浪者的信仰——比较分析《米调》和《丛林下的冰河》 /181

当“法国情郎”遇上了“中国少女”

——读《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 /189

家族血脉追寻中的思考和探索——评沈宁小说《百世门风》 /193

后 记 /197

第一编

现象

- ◎ 中国记忆的文学重塑——论新世纪欧美华文小说的『中国热』
- ◎ 论当前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窄化』和『固化』
- ◎ 21世纪文学新势力——新移民海归文学
- ◎ 在海外延展华文之势——评2009年欧美华文小说
- ◎ 遭遇『圈地运动』的欧洲华文文学

中国记忆的文学重塑

——论新世纪欧美华文小说的“中国热”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移民文学”所酝酿起的华文之势，将欧美华文文学推向了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高峰。欧美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板块，生活的压力和文化的隔膜曾让这个中国文学的孩子屡受挫折：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留学生文学”掀起一波创作热潮后，陷入了持续几十年的低潮，直到 90 年代，才又显现出“新移民文学”的勃勃生机。到了新世纪以后，欧美华人作家与中国大陆文坛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文学创作也呈高速发展的趋势，集体向中西方文学世界展示现代汉语的力量、中国文化的精深和中国人的坚韧品性。

中西文化比较、两性关系的讨论、“边缘人”处境等，这些“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热衷的基本题材经过四十年华文文学的创作沉淀，流转进新世纪以后，成为欧美华文文学的母题。在文化移植阵痛的伤口逐渐愈合后，创作者获取了全新的艺术视野和想象空间，因而对这些文学母题阐发出新的个体认知。同时，新世纪的欧美华人作家不断开掘新的题材，对中国故事的表达和中国艺术的重现已成为文学创作的新亮点和新增长点。还需要注意的是，新世纪的欧美华文文学更加平实厚重，创作者对现代主义的热情在逐渐褪去，潜移默化间，倒是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冷静回归。正如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所述，艺术的目的是使人对事物

的感觉如同人所见的视像那样，欧美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心态变化赋予了作品新的艺术气象，同时也引领接受者触摸当下真实的海外生活，收获崭新的阅读体验。

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是新世纪以来欧美华文小说的创作热点。20 世纪以来，德龄公主、汤婷婷、谭恩美、张戎、程抱一、哈金等众多华人作家的小说为西方世界呈现了中国文化的神秘和朴拙。2000 年诺贝尔文学奖对《灵山》的偏爱，开启了西方对中国题材的持续关注。高行健的作品正是凭借其多元的中国文化元素和独特的中国乡土经验吸引了西方的目光。严歌苓自《天浴》开始将创作视野投向中国故事后，从 2004 年的《谁家有女初长成》始，她以书写中国故事为重点，虽然严歌苓的初衷是向批评界挑战，主动进行题材转型^①，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故事将严歌苓的小说推向了一个高峰。《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以纯熟的叙事技巧、鲜活的人物塑造与现代汉语的优美表达，定格了一幕幕动人的中国往事。应该说，欧美华文创作者对中国故事的开发还处于初始阶段，但中国故事的出现无疑拓宽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空间，更重要的是，直接提升了其世界影响力，市场的积极反馈敦促“新移民”作家回归其最熟悉的国内生活之中，扎根于民间，挖掘中国的文化之根和人性之美。就如同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艺术的断语：时间老人像一位老练的教师，指出其中的墨渍、涂抹和删改之处。未来的杰作就是在这些练习本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中国故事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再兴有其原因。首先，中国的世界地位不断提高，中西文化对话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身处海外的创作者更有热情 and 责任感去呈现中国真实的文化面貌和民间风情。同时，西方受众渴望了解更微观的中国和更精致的中国文化。其次，20 世纪欧美华文文学对中国故事的传达既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又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误导。小脚、巫术、民俗、神话，通过《孙行者》、《喜福会》、《接骨师的女儿》、《等待》等在西方世界有一定影响力的英语表达，无形中限制了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

① 严歌苓自述当时评论界说她只写“新移民”，于是她就刻意写国内故事。

中国故事需要一次祛魅、去神秘化的文学澄清。虹影和严歌苓的中国故事就为读者展现了活泼的人性和厚实的乡土，她们以真实生活为基础，规避了对中国文化劣根与人性蒙昧的反复展览与过度强化。再次，20世纪60年代以来，留学生故事和新移民故事为大陆读者呈现了西方文化景观。无论是《芝加哥之死》里吴汉魂灵魂的无所依傍，还是《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在商界的华丽转身，他们所构建起的西方生活在几十年的重复创作中被耗尽了新鲜感。西方不该是“新移民”向母国读者描画出的“乌托邦”。如果脱离中国现实生活，完全构筑符合西方审美标准的中国传奇，欧美华文文学其实是在无形中束缚了自己，是主动制造出海外华文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坛的界限。从本质上说，海外华文文学的受众市场，“根”在国内。作品源于中国生活，贴近中国现实，也更容易赢得读者的信任与共鸣。无法加入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并与之进行对话，对欧美华文文学的发展实质上是一种制约。中国故事的重塑是海外华文小说向中国当代文学的回归，从目前的创作实绩上看，它也对大陆文坛和文学市场形成了一定冲击。

具体来看，中国故事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成长故事。创作者往往定格于“青春”，记述自己在国内经历的少年、青年时期的成长故事，以此唤醒大陆同龄人的集体回忆。例如苏炜的《米调》、严歌苓的《穗子物语》，清新真挚，一扫之前新移民奋斗史的苦难和滞重。米调是一位拥有传奇经历的有信仰者，他早年狂热地信仰革命，作为最著名的红卫兵领袖之一，在“文革”高潮的1966至1968三年间，他是北京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九六六年北图老馆的首都文艺界批斗大会，红卫兵冲击东单五条的玛利亚修女会，‘万人围斗洋修女’；一九六六年底北师大南下冲击山东曲阜孔庙孔林，一九六七年北京火烧英国办事处。”^①在作为“203”组织的领袖被通缉后，他带领人马去山里打游击。小说通过对他昔日恋人廖冰虹的回忆，勾勒出了一个“青春”米调的成长史。另有一些小说进一步对成长叙事投注了性别意识，侧重于强调女性的个体成长，如虹影2000

^① 苏炜．米调．钟山，2004（4）：8．

年推出的《饥饿的女儿》和2009年创作的《好儿女花》，共同见证了“六六”从“女孩—妻子—母亲”这一完整人生蜕变中的身体觉醒和心灵觉醒。

二是20世纪50至80年代的生活故事，凝聚了当下海外华文创作的中坚力量的共同回忆。这个时间段，发生了中国最复杂的政治事件与最重要的经济转型，其中最鲜明的政治符号是“文革”，它一直是西方世界急欲破解中国的密码，很多海外华文作品都将“文革”作为一项中国遗产向西方展现，焦点在人性的戕害、攻讦、扭曲、时代的疯狂和命运的莫测。而当下的华文小说正逐渐挣脱“文革”十年叙事的拘囿，“文革”前后，即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社会风云动荡，成为最热点的创作选题。回顾这一段时间的政治风云和个人经历，是创作者以文学的形式进行灵魂的告慰和精神的洗礼。高尔泰在美国创作的散文集《寻找家园》，其中既有对江南故乡的风俗风情风物的描写，又有对西北大漠农场生活的展现，两组生活并置，勾画出了作家比较完整的精神轨迹。他在《寂寂三清宫》一文中写道：“以前在惊涛骇浪中浮沉，我曾经渴望寂静，梦想着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好安顿遍体鳞伤的身心。现在我得到了寂静，同时也就明白了，寂静不等于安宁。轻柔温软的寂静，有一个冷而且硬的内核；它是刹那和永恒的中介，是通向空无的桥梁。当我感觉到，而不是推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产生了逃避寂静的欲望。”^①这是他逃离“夹边沟”到莫高窟后的心灵裸呈。习惯动荡的人一旦安稳下来，反而会产生对空虚的惧怕。如今的北美生活，对他来说，同样是寂静的，甚至连“莫高窟”的相伴都已失去，遍体鳞伤的身心只能得到治疗而无法彻底治愈。高尔泰用文字再现了中国生活的点滴，从根本上说也是他“逃避寂静的欲望”的精神慰藉。《饥饿的女儿》则生动勾勒了1961—1963年的“饥饿”图景，虹影的文学“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尘封回忆。张翎的《金山》，将1952年的“土地改革”作为小说一处重要的历史坐标，小说中墨斗为了坚守方氏家族的尊严，枪杀了怀乡、六指、锦绣和他自己，众人皆歿成为小说中最惊心动魄的场景，张翎以此揭示了乱世中在严酷

^① [美] 高尔泰：《寻找家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189。

现实面前如蝼蛄的生命。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以两性（他与马格丽特）对话的方式将记忆定格在1950—1980年这一时期。作者在“不谈政治”的理念下始终与政治眉来眼去，虽然有细腻独特的人性刻画，但是这部小说并未完全剥离“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烙下的文学印记。

但是，新世纪欧美华文小说对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历史的叙述是相当暧昧的，应该说新意很少，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类叙事更像是“文革”苦难的“先锋队”与“继承人”。大量渲染政治恐怖事件中人性角斗的刀光剑影，也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背叛和僭越。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历史阶段？它是一次题材的革新，还是另一个角度的“文革”延续？这都是创作者在写作中需要思考的问题。例如高行健在《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里集中描写自己在1950—1980年间的生活，但他选择将苦难、迫害与屈辱一一袒露并强化。汹涌的感情常常冲破语言的平静。高行健的作品因此也遭遇了西方世界颇有意味的政治解读。

三是家族故事。家族故事有两种讲述方式。一种是将单个家族作为一个完整的叙述对象。如沈宁的《百世门风》以沈（沈钧儒）、陶（陶希圣）两家历史为主线，完成对两大家族的文化寻根。这是沈宁留美多年自我沉淀后的灵魂洗礼，他揭示出沈、陶两家的百世门风，即家族传承的精神内核：感恩、书生的傲骨与独立、明确的是非观念。他用文字为自己的家族、自己的血统擦拭了历史的尘埃和岁月的不惑，为了忘却的记忆，重新赋予沈、陶两大家族已被世人遗忘的荣耀和尊严。陈玉慧的《海神家族》以台湾的“妈祖”为精神皈依，同样是以“寻根”为叙事线索，通过三代台湾人的家族故事，造就了一部“失父”史诗和乡愁史诗。另一种讲述方式是只将家族作为一项重要的叙事元素，如张翎的四部长篇小说：《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和《金山》，都有清晰的家族链条，在这些作品中，“家族”承担的功能是一个中西文化想象的载体，它是个人个性与众人人性、个体独立性与集体趋同性展示与对垒的平台，家族昭示的是符号意义。家族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家族故事是需要被重视的中国题材，它的文化使命不应该只停留在形式与表面上。因此，华文作家在小说创作中进一步开发第一种类

型的家族故事，还能激发出更多的文学新意、更强的文化潜力和更大的思想张力。

四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追溯和古代人物的重塑来品读文化。与之前的三类故事相比，历史叙事最有新意，它是对“中国故事”题材的扩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创作基点在中国传统文化。赵淑侠的《凄情纳兰》和陈玉慧的《CHINA》就分别从文人自传与艺术传承的角度雕琢着历史故事的文化元素。《CHINA》通过18世纪一个西方矿物学家魏瀚的中国游记，讲述了中国瓷器艺术的灵秀神韵和精深内涵。陈玉慧用闪烁着“莎剧”语言神采的小说介绍了中国制瓷的详细过程和赏瓷的美学标准。景德镇的温润静谧、紫禁城的神秘宏伟、青花瓷的典雅含蓄与异国恋情的隽永凄美共同交汇成一池伤情。《凄情纳兰》以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为描写对象，呈现了纳兰性德的风流文采与惆怅心境。叶赫氏的家族流变荡气回肠如黄钟磅礴，容若与涵瑛、沈宛的情感纠葛缠绵悱恻如丝竹哀婉。而赵淑侠本人就是满清正黄旗叶赫氏后人，这一身份更是为小说增添了神秘感。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部文化侧重点不同的作品在写作上表现出共同的叙事构思和艺术追求：在叙述内容上，都是以史为辅，以情为主，爱情是叙事的重心；在艺术原则上，遵循着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历史故事小说如能将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三者进行整合，并实现某种程度的中国哲学层面的提升，而非单一的叙史或者言情，那么，作品会蓄积强大的文明之势与艺术之力。

欧美华文作家对小说的艺术表达，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90年代，创作者倾心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如严力的“精神分析”、戴舫的“解构”、薛海翔的“后设小说”。但这类小说与20世纪80年代大陆先锋文学有共同的创作误区，即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摹其形而失其神，产生的艺术效果是技术上的现代、内蕴里的传统。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华文作家选择回归现实主义。“在最好的现实主义叙事作品中，我们为自己意识到的真实所震动：我们根本想象不到我们翻开下一页时会出现什么样的真相大白，但当它出现后，我们意识到这也是必然的——它抓住了我们历来就

了解的，不论是如何朦胧地了解的，经验的真相。”^① 欧美华文小说中撼动人心的现实主义作品正是通过扎实的文学表达来逼近真实的艺术效果。欧美华文小说的最显著的艺术特点就是紧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两个“典型”是作者坚守的艺术准则。美国主流文坛高度评价美籍华人作家哈金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写实主义路线的伟大作家，事实上，相当数量的欧美华文小说创作者受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影响很深，他们同样偏爱现实主义。同时，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也更加贴近中国受众的接受心理。

欧美华文小说家都喜欢借助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抗战、“文革”、三年自然灾害、“反右”、改革开放等，以特定时期的环境激发出最大的戏剧性，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例如，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选择“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聚焦地是南京的美国教堂。南京、美国人、教堂都是敏感而意味深远的独特元素，它承载的是政治、种族、宗教这三个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寄居者》以孤岛时期的上海租界、犹太人聚居地为背景。再看典型人物，“典型”体现在人物具有多重身份和独特个性上，他们是庞大关系网络的核心。《寄居者》中的彼得是一个逃亡到中国上海的犹太人，他为逃避德国法西斯迫害而不断躲藏，但挣不脱日本人“终极解决方案”的魔掌。在重重生存危机下，他与中国少女 May 恋爱，与濒临死亡的新四军军官做交易，并在紧急关头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蓄意谋杀了一名中国清洁工。彼得就是“德国—犹太—日本—中国”这个种族网络中的核心，同时他又在逃亡这一特定背景下爆发出最大的生命潜能。严歌苓塑造彼得这个人物形象，利用其不同寻常的特殊身份和非常处境，凸显了人性的晦暗和诡谲。彼得俊美的面庞和绅士的体态下隐藏着坚毅、脆弱、冷酷的灵魂。而哈金在同样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南京安魂曲》中，塑造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院长明妮·魏特琳这一形象，她的特殊性表现为：美国人、女性、教会和“二战”。她依托美国教会在日军屠城时，保全了上万中国平民的性命，但又因她的疏忽而不得已交出了二十一名中国女性，最终她被美国人设计诬陷，抑郁而死。哈金对这个

^① [美]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8。

人物进行了多层次的塑造。她是政治的角色，联结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日关系；又是性别符号，她在日军的刺刀下，保护中国妇女的性命，并为其开办各种辅导班，教授她们谋生技能；还是文化符号，她为教会服务，是灌输给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美国人。

但是，海外华文作家对典型环境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倾向性，因为政治性最突出、阶级斗争最尖锐的中国事件，往往是西方读者最有兴趣和最习惯接受的“典型”。其中“文革”是海外华人创作者最易选择的典型环境。创作者首先必须考虑如何将“文革”叙事不落入控诉与流泪的俗套，如陈平的《七宝楼台》和王瑞芸的《姑父》，将时代造成的“伤痕”落实在对人性伤痕和生存伤痕的严肃叩问上。同时，创作者也应对其他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进行开发。严歌苓的《小姨多鹤》是一次成功的文学实践。她塑造了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苟且偷生的日本“二战”遗孤竹内多鹤这一形象，多鹤与中国多重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小说的重点，也是小说的看点。这是海外华文作家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深化和再造。严歌苓设置的典型环境时间段为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陈列的典型环境有日本战败、中国东北、“反右”、“文革”、中日邦交正常化、改革开放等，塑造的典型人物是在中国东北生活的日本遗孤。历次中国政治运动与日本遗孤这两个关键词之间碰撞出了颇具新意的戏剧性，小说的魅力就在两个典型不断的互相冲击中弥散开来。歌德说：“一切高尚的东西就其本身而言是深沉的，好像是在睡觉一样，是矛盾把它唤醒，并向它挑战。”^①具有特殊身份的日本遗孤在特殊时期的非凡遭际，激发了读者阅读的兴趣与思考的冲动。

欧美华文小说创作者笔下的中国故事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作者本人亲历的，如《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红浮萍》、《饥饿的女儿》、《七宝楼台》、《浪》、《海神家族》等；二是建立在一定真实史料基础上的，如《沙漠与沙》、《小姨多鹤》、《金山》、《凄情纳兰》等。无论取材于哪种途径，都不乏优秀小说。就目前的创作实绩与创作势头来看，中国故事写作在欧美华文

^① [美] 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45—246.

小说中占据的比重会逐渐增大，中国故事将更加丰富多元，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更加扎实精进；同时，中国故事的发展将使欧美华文作家不只是在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上来来往往，而是真正在中国当代文坛站稳脚跟。

2011 年